

论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

——兼论苏联莎学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影响

陈涛¹, 李伟民²

(1. 青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青海 西宁 810007; 2. 四川省粮食学校, 四川 成都 610081)

摘要: 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世界莎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以唯物主义为武器, 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肯定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但是, 苏联莎学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应用于莎学研究的特点。中国莎学研究受到俄苏莎学特别是苏联莎学全面、持续的影响。

关键词: 莎士比亚研究; 马克思主义; 苏联莎学

中图分类号: I51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0117(2002)02-0055-05

作为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莎学的发生、发展与外来莎学思潮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伴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俄苏杰出文学家、莎学家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价。尤其值得提到的是, 中国人在接受俄苏莎学过程中, 苏联莎学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开始引起了中国文学家和中国莎学学者的注意。并且对中国莎学的形成, 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杨周翰先生所说, 苏联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莎学, 主要特点是: “1) 力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 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 2) 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 反对把他同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联系起来看; 3) 强调莎氏之人民性; 4) 与以上诸特点相联系, 强调莎氏的乐观主义; 5) 强调莎氏的现实主义。以上的方向应当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往往缺乏辩证观点”。^[1] 而且就其苏联莎学本身特点而言, 在较大程度上是步德国和英国浪漫派莎学的后尘, “不过加上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 而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局限于阶级分析”。^[2] 这种机械、简单化的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莎学研究, 对研究莎作, 对理解马克思主义莎学往往产生某种误导。它“强

调革新, 忽视继承, 不承认莎氏无论在‘道’或‘文’上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在人民性的模糊观点下, 为莎氏文过饰非, 莎氏虽有赞美个别劳动者的地方, 但明明也有蔑视、害怕劳动者和劳动群众的地方, 但苏联学者多避而不谈, 相反, 他们有不适当地拔高莎氏的思想意识的倾向。帝王将相的品德在他们笔下也说成是非帝王将相所独有。莎氏在写悲剧时明明已堕入悲观的深渊, 他们必定要说并不悲观”。^[3] 构成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这些特点, 对中国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中国莎学研究的方向, 而且至今仍对中国莎学研究起着指导、参考作用。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的发展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所以就有必要理清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特点, 追踪其发展线索。但是, 在中国莎学研究中, 对苏联莎学的影响研究一直是空白, 国内这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 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莎学在借鉴外来莎学理论方面的一项重大缺失。有感于此, 我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 综合概括, 力图真实的描述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理论特征, 并通过这一描述更清晰的认识到、把握住“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的理论特征, 以此就教于中国莎学研究方家, 也以此作为对本世纪中国莎学受外来莎学理论影响

收稿日期: 2001-04-27

作者简介: 陈涛(1973-), 女, 四川成都人, 青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

李伟民(1955-), 男, 四川成都人, 四川省粮食学校高级讲师。

研究的探索。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学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译介,使中国文学家看到了一片新天地,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国人对莎士比亚有了更加亲切和更加深刻的体会。马克思主义莎评成为中国文学家解析文学作品、评论社会情况,甚至成为反侵略、反压迫的一个有力武器,研究莎士比亚则放到了次要地位。但是,毕竟中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莎评。

如果说从20年代开始译介的俄苏莎评对于“发生期”的中国莎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指导作用,并使我们知晓了如璀璨繁星的俄国文学巨擘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与批判;那么,通过对苏联莎评的译介就为最初的中国莎评,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原则。历史的看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都从苏联的莎士比亚评论中得到过相当多的启发。甚至从我国莎学家在批评西方莎学学者时也能窥见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影响的蛛丝马迹,“西方学者一向不愿认真研究伊丽莎白的社会时代背景,不肯重视人文主义的思想影响,也不知道试图用阶级观点分析人物性格的特点,补救这方面的缺憾,也许是今后发展莎学研究的另一条道路”。^[4]而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莎作中的人物性格特征,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

但是,随着中国莎学研究近年来的长足发展,对莎作理解的日趋深刻,对马克思主义的独自钻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在某些方面正确性的怀疑,经过多年的思考、比较、研究,结合莎士比亚创作的实际情况,中国莎学研究者开始反思: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学是否完整、准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联系历史和时代的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中难道没有左的影子吗?是否在苏联的莎学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否有贴标签的现象?是否有为了适应政治形式将莎士比亚挪入特定的政治理论范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中国莎学研究者深究。

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接受中,中国莎学学者不难发现:“俄国现实文化的缔造者在为争取洋溢着真正人民性的乐观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斗争中,一向把莎士比亚看作自己的同盟者,因而一直很重视这位戏剧大师。这种重视的程度,在苏联莎学家看来,是由于苏联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评论思想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结果。”^[5]1934年茅盾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转述了苏联莎学家狄纳摩夫1933年发表的论文《再多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狄纳摩

夫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莎士比亚看成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创作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研究莎士比亚就是要使苏联作家“莎士比亚化”,而“莎士比亚化”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借莎士比亚创作所提出的衡量文学作品的原则。从1935年起,先由鲁迅编辑,后由黄源编辑的《译文》共发表了6篇莎学译文,其中的4篇苏联莎评相当深入地阐释了莎士比亚戏剧遗产的社会价值以及马克思关于莎士比亚的论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苏联莎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从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最初的著述起,对整个文学理论研究(包括莎作研究)来说,就开始了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方法论的过程。苏联莎学界感到比较亲近的流派是:它肯定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肯定莎作的人民性与剧作家社会哲学观点中归根结蒂的乐观精神。虽然这种看法往往妨碍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莎作进行深入剖析,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应用于莎学,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类共性的倾向。但是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却奠定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在其莎学论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特别注意那些他们的出现标志着阶级更迭的伟大作家,也必须说,几乎所有的伟大作家恰恰都是这种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见证人、代言人和参加者。马克思特别喜爱的作家有:埃斯库罗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及其他等等,——他们无疑是这样的人物。”^[6]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批莎学研究者发现,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和荷马的知识多么惊人的渊博,说他能从头到尾背诵荷马史诗中的许多篇章,还能用德语和英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本。^[7]以歌德和莎士比亚所发现并塑造的人物语言,帮助马克思构思并形成自己的词句。他们帮助马克思观察世界,帮助他诱导别人分享他对这个颠倒而混乱的世界的看法,设想一个将来的国度形象加以对照。^[8]莎士比亚的泰门被马克思用来说明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如何比一个现代的德国哲学家更能清楚地说明金钱的主要作用。^[9]马克思在他当时已开始认为是阶级斗争的事业中,通过引喻、引文和潜意识的联想,把他所赞赏的作家当作斗争的武器。马克思不仅仅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分析说明当代政治问题,还把莎氏剧中人物投射到过去的历史中,他认为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语言相当恰当的向读者表达了自己对当代事物的观感,莎士比亚洞悉人类社会、行为的发条、齿轮,并有能力创造出显示这些发条和齿轮如何工作的模型。在

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著作中一样, 莎士比亚总是占据着一个突出的地位。^[10] 恩格斯也曾给予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以高度的评价, 并提到“莎士比亚式的生动性和戏剧效果”。^[11]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莎剧的历史内容、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 这是马克思主义莎评对世界莎学的极大丰富。卢那察尔斯基在剖析莎剧的艺术特点时指出:“莎士比亚是个多方面的心理学家”, 即莎士比亚特别善于刻画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莎士比亚的人物与作者的周围环境联系得非常紧密, 充满现实的矛盾和斗争, 浸透着它的精华, 显得富有生命; 它们仿佛不由自主地活动着, 互相冲突, 受苦受难, 取得胜利或者灭亡; 灭亡是有成果的、光荣的, 是人民最后胜利的号角。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极端喜爱和高度评价, 所以在苏联的莎学研究中, 特别是被誉为马克思主义莎评中, 从来没有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进行过根本性的否定, 反而视一切否定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人和著作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

与卢那察尔斯基几乎同时, 而去世则要晚近 30 年的苏联著名莎学家斯米尔诺夫, 在他的《莎士比亚及其剧作渊源》、《莎士比亚·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莎士比亚技巧论》、《莎士比亚的创作》等著述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和文学史进程的理解,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评价莎士比亚的遗产。他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 分析莎士比亚各个阶段创作的主要特点, 把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 指出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 揭示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斯米尔诺夫曾经明确宣布: 我们不要求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什么特殊的资产阶级内容。这样的内容一般说来在那个时代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莎士比亚作为生活于特定时代的作家, 在表现其创作特殊性的同时, 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手法更蕴含于时代的普遍性之中。斯米尔诺夫认为莎士比亚通过他的戏剧“道出了新道德、新世界在意识形态中即将取代堕落的封建主义旧道德观念(这一历史规律), 所以莎士比亚是他那个历史时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他与伴随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他也属于他那个世代”。^[12] 所以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成为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到那时为止最伟大的进步革命时代的彻底代表”^[13] 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这一明显特点, 原因在于莎评“在处理方法是现实主义的, 在思想意识上是

进步的。”莎士比亚这样做“甚至更合乎自然”。莎士比亚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当然的理想代表。他对周围世界的反映, 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 对时代、政治、社会潮流变化都是极为清晰和相当复杂的。莎士比亚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来的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不仅仅表现在冲动的不满或者对明显社会罪恶的讥讽, 而是表现在深层次的对世界的认识, 以及对整个人性演变历程的完整价值体系之中。在斯米尔诺夫看来, 虽然莎士比亚经历了动荡时期, 但他的观点和风格的主要方面始终保持一致, 即针对封建制度、思想和风俗, 他坚持进行战斗的和革命的抗争, 也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欲望、良心的呼声和对自己以及世界的责任感基础上的, 而不是建立在宗教或封建传统的权威基础上的新道德; 对世界、人生和现实采取科学的态度, 抛弃所有形而上学式的解释; 表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特有的活力和乐观精神。

从莎士比亚的实际创作来看, 斯米尔诺夫以上一段分析是大有问题的, 斯氏联系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是对的, 但是他无视莎士比亚思想和艺术创作风格上的变化, 将莎士比亚及其创作拔高到针对封建制度、思想和风俗, 坚持了战斗和革命的抗争, 不是建立在宗教和封建传统权威基础上的新道德, 则未免有按斯氏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环境, 有意或无可奈何的拔高莎士比亚的嫌疑。这是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莎士比亚, 缺乏辩证发展的观点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从莎士比亚的创作实际来看, 其剧作中最主要的思想并不是针对封建制度、思想, 也很难说其中蕴藏着战斗和革命的抗争精神。这种貌似对莎士比亚及其剧作思想意义的拔高, 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莎士比亚及其剧作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意义。

斯米尔诺夫显然也意识到这一定位的矛盾, 所以他又以不确定的口吻谈到, 莎士比亚不是封建贵族的理想代表, 也不是以资产阶级外衣装点起来的新贵族的理想代表; 是资产阶级理想代表, 又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代表; 归根结蒂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理想代表, 是资产阶级纲领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在他们首次向封建秩序提出挑战时以人性的名义提出这个纲领但后来又拒不承认。显然, 强调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正是斯氏及其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和奠基石, 是分析、评论莎士比亚及其剧作的常规武器之一。

被誉为马克思主义莎学之一的莫洛佐夫在进行莎学研究时, 在汲取前辈学者经验的基础上, 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阐释莎剧。

他提出:苏联莎氏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是莎氏的作品和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这之间的关系。即文艺复兴是一个充满了伟大的革命性的剧变的时代。那是人的个性对中世纪的强迫性的行为标准的反抗。莎士比亚梦想着一种真正自由的人的个性。但是莎氏在刚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世界里给他的人文主义理想找不到一条出路。透过莎剧的世俗性,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是面对着最广大的观众为人民群众写作的。莎士比亚开始剧作家生活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当他一再目睹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血腥现实时,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他要为这种冲突所造成的悲剧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办法,果然,他如愿以偿,为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找到了解决办法,即“在他对人性的未来的胜利的憧憬里和在他坚定不移的对人的信念里”,对人类未来的信念以及给年青一代预备的幸福远景之中;塑造未来人类的理想人物,并且在对人类命运的总体把握之中,为一代新人铺下了走向幸福的道路。人类在看到新世纪曙光的同时,必将征服黑暗势力,理想中的人始终是莎士比亚创作中歌颂的中心。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苏联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愈来愈远离对莎剧人物的静止描绘,在近距离里对莎剧主人公性格的种种不同特征进行正面的和多侧面的勾画。

可称为苏联马克思主义集大成者的阿尼克斯特继承发展了上述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的莎士比亚研究。他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把莎士比亚的文学活动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的。

从中国莎学发展来看,苏联莎学特别是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莎学理论对中国的莎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学习者研究莎作和外国文学的指导书。从这些著作中,中国莎学学者才开始获得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创作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成为指导中国莎学研究者解析莎作的有力武器。尽管这种研究还是生硬、不成熟地,但毕竟又前进了一步。^[14]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学采取的真正科学的客观态度的立场,要求从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考察它的发展的历史过程。^[15]阿尼克斯特认为客观态度和抓住历史过程是研究莎作的钥匙,其根本特征就是将莎士比亚的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从而在莎评中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阿尼克斯特莎学理论的支柱。阿尼克斯特认为“莎士比亚深刻地、多方面地描写了他的时代。他的戏剧创作乃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16]艺术上的真实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俄国现实文化的缔造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倡导者,在为争取洋溢着真正人民性精神的乐观现实主义的斗争和阐发中,一向把莎士比亚看作自己亲密的同盟者,并且一贯非常推崇莎士比亚这位戏剧大师。阿尼克斯特甚至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俄苏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西方,莎士比亚更多地是对浪漫主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迥异于西方,莎士比亚在俄苏则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面旗帜。现实主义作家认为欣赏莎士比亚艺术,能强化当代人的精神力量,激发人们在真正人道基础上为改造生活而奋斗的愿望。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于培养人们对生活的美感、对真理的热爱、对人的坚定信念具有特殊作用。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真、善、美是我的全部主题。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正是从俄苏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探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把莎氏创作同历史、现实生动联系起来,从而在自己的研究找到了理解天才戏剧家创作的依据。首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评都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看法,把莎士比亚引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且对世界上从来不绝如缕的否定莎士比亚的谬论作了极明确的答复。第二,苏联莎学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均非常注重莎作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把莎士比亚誉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评极为重视莎作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品中人物和环境的关系。第三,马克思看到莎士比亚通过他的戏剧反映了英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苏联莎学则进一步强化莎剧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第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莎士比亚和莎剧中人物所具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莎作的人民性,而且认为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的出现,往往标志着阶级的更迭,作家本人也由此而成为伟大的变革的见证人、代言人、参加者,从根本上肯定莎作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第五,把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

考察中国莎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近百年的中国莎学发展史上,中国莎学除了对英国莎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外,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受到俄苏莎学特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全面地持续地影响,可以这样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研

究产生了积极、广泛、深刻地影响, 并且帮助、指导中国的莎学研究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莎士比亚作品。这种影响不仅过去存在, 现在存在, 而且在未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也将继续发挥影响, 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通过对中国莎学的分析,

我们也发现中国莎学研究在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经验基础上, 正在逐步或已经初步构筑了自己的莎学理论体系, 正在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理论、方法, 并且力争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杨周翰. 20世纪莎评[J]. 外国文学研究, 1980. 45.
- [2] 杨周翰. 镜子与七巧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99.
- [3] 顾受昌. 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续)[J]. 外国文学研究, 1986. 67.
- [4] (苏)阿尼克斯特. 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译本)[M]. 徐克勤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396.
- [5] 孙家. 莎士比亚辞典[Z].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346.
- [6] (英)伯拉威尔. 马克思与世界文学[M]. 梅绍武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0. 4, 116.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58.
- [8] (苏)斯米尔诺夫. 莎士比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M]. 杨林贵译.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297.
- [9] 孟宪强. 中国莎学简史[M].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64.
- [10] (苏)阿尼克斯特. 英国文学史纲. [M]. 戴镛龄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2.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49. 42.
- [12] 张泗洋, 徐斌, 张晓阳. 莎士比亚引论(上、下)[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25, 473.
- [13] 徐崇温. 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思潮[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35.
- [14] 乐黛云. 世界诗学大辞典[Z]. 吉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 406.
-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 844- 847.
- [16] 杨周翰. 镜子与七巧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101.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文艺[A].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13, 14, 111. 李伟民. 俄苏莎学理论在中国[J].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 1998. (1).

Discussing on Marxist Shakespeare Studies of Soviet Union

——Both Discussing about the Influence to China's Shakespeare Studies by Soviet Union's Shakespearean Studies

CHEN Tao¹, LI Wei-min²

(1. Qinghai Junior Teachers' College, Xining Qinghai 810007, China;

2. Sichuan Grain Research School, Chengdu Sichuan 61008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theory of Marxism- Shakespeare has been developed much in previous Soviet- Union, the research on the so- called theory of Shakespear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ines itself to the subject of analysis of class. It lead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Shakespeare to a improper state by simply using Marxism on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 The school of Marxism- Shakespeare in previous Soviet- Union has a deep and great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n Shakespeare in China.

Key words: School of Marxism- Shakespeare; Soviet- Union; Shakespeare